

舞台艺术: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明文军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这极不平凡的5年,我们有一种共同感受: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时提到:文艺创作持续繁荣。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倍感精神振奋、情绪激昂!结合自身工作,深刻感受到,这5年来文化艺术领域的工作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进展、新成效。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不同场合,就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坚定文化自信等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艺繁荣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广大舞台艺术工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引和激励下,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创作生产不断向纵深推进。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建设健康、积极文艺生态的根本保证。近年来,《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具体举措,为艺术创作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各地党委政府大力支持文艺工作,为文艺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如,上海市对18家市属国有艺术院团实施“一团一策”政策;湖北、山东、内蒙古等省区市出台推动艺术创作、扶持国有艺术院团深入改革发展等政策。国家艺术基金自成立以来,累计投入18.8亿元,“十三五”期间更将投入25亿元。

艺术创作规划不断健全,是建设健康、积极文艺生态的重要依据,全国初步形成“有规划、有项目、有资金、有组织”的舞台艺术创作生产格局。2017年,文化部发布《文化部“十三五”时期艺术创作规划》,围绕迎接党的十九大、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提前明确重点创作任务,突出重大艺术项目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十三五”期间,文化部将实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戏曲振兴工程、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等一系列重大工

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创作者要与塑造的人物“心灵相通”

——主旋律题材人物塑造会议综述

本报记者 刘 茜

9月29日,文化部艺术司组织举办主旋律题材人物塑造研讨会。欧阳逸冰、王安奎、宋宝珍、刘平、陈曦等专家学者与会,围绕戏剧主旋律题材人物塑造所涉及的创作思想、创作态度、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论述。会议由文化部艺术司艺术研究处处长王华宇主持。

应有什么样的创作思想?

与会者结合理论与自身的思考,对主旋律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辨析与阐述,认为这是进行主旋律题材创作实践、评论、理论研究的前提。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剧作家欧阳逸冰表示,主旋律作品不是政治宣传的代名词,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作品,能够表现历史发展的趋势,表现时代的精神,表现人民的愿望作品,就是主旋律。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所原所长王安奎认为,理解主旋律作品应该秉持比较宽泛的理解,传达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就符合主旋律作品的要求。“英模人物题材、革命历史题材都应该算在主旋律作品的范畴。主旋律戏剧代表着一个国家戏剧创作的主流,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体现了时代的社会价值观,是传播精神文明的渠道。在每一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平说。

如何创作好主旋律作品中的人物?与会者结合豫剧《焦裕禄》、话剧《母亲》、河北梆子《李保国》、话剧《谷文昌》《麻醉师》等具体作品分析,提

醒项目,形成上下联动、全面发力、勇攀高峰的艺术创作生产工作体系。

改革评奖、加强评论,改进和完善艺术评价体系,是建设健康、积极文艺生态的重要保障。文化部精简压缩评奖项目和奖项数额,进一步完善评奖机制,如开展“一剧一评”“一团一评”,说真话、讲道理的文艺评论氛围越来越浓厚。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是建设健康、积极文艺生态的题中之义。2014年底,中宣部、文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就严格控制党政机关用财政资金举办豪华文艺晚会作出明确规定,过度追求舞美大制作的不良势头有所遏制。2015年9月,中办、国办下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后,舞台艺术工作者更加重视社会效益。据统计,2013年至2016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分别为165万场、174万场、211万场、231万场,观众分别为9亿人次、9.1亿人次、9.6亿人次、11.8亿人次。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方面,舞台艺术的作用不可替代。

在服务人民中接受人民的检验,是建设健康、积极文艺生态的重要目标。5年来,各级文化部门大力实施低票价惠民政策,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走进剧场、贴近舞台。文化部率先在主办的各项活动中降低票价,如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100元以下的低价票占到65%,20元的门票占到30%。河南、山东、陕西等地每年政府购买惠民演出都在万场以上,安徽等地实现全省行政村全覆盖。这些文化惠民的措施真正地使最基层的、有迫切文化需求的群众共享艺术发展的成果。

阳春布德泽 万物生光辉

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2014年11月,中宣部、文化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文艺界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意见》。文化系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力度空前,蔚然成风。以2016年为例,各地共开展创作采风和对结对帮扶活动9500余项,参与的舞台艺术工作者近10万人次。努力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以饱满的热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已成为广大舞台艺

术工作者的共识。

主题实践活动的深入、持久、常态化开展,扭转了部分舞台艺术工作者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的局面。特别是现实题材创作,越来越多的舞台艺术工作者深入采风,长期扎根基层,反复深入生活。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白皓天18次深入西藏体验生活,创作了西藏历史题材话剧《共同家园》,12次赴福建东山县,创作了现实题材话剧《谷文昌》。中国交响乐团在云南红河、福建厦门建立采风创作基地,创作出《哈尼交响》《南音交响》。

广大舞台艺术工作者摒弃浮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涌现出一大批喜闻乐见的优秀艺术作品。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开展两年来,重点扶持了《西安事变》等20余部舞台作品,国家艺术基金也设立了滚动资助项目,评选出剧目《保婴记》等18台剧目予以重点扶持打磨,推动艺术水准不断精进。京剧《西安事变》、昆曲“临川四梦”、豫剧《焦裕禄》、评剧《母亲》、淮剧《小镇》等剧目题材丰富,表现手法多样,是近年来舞台艺术创作提高原创力的具体体现。

讲好中国故事,还体现在围绕重要时间节点举办重大纪念活动和创作活动。2012年,举办了“讴歌伟大时代,艺术奉献人民——2012年全国优秀剧目展演”。2014年,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优秀剧目展演,并举办届中国艺术节100元以下的低价票占到65%,20元的门票占到30%。再比如2015年组织创作大型文艺晚会《胜利与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受到社会各界和国际嘉宾高度评价。2016年,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汇聚了67台参演参演剧目和1000余件美术作品;同年,组织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音乐会《信念永恒》和美术作品展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永远的长征》、20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文艺演出《最忆是杭州》等重大文艺活动,以优秀的文艺成果和良好的精神面貌,较好地服务和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得以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任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古老的传统艺术迎来了春天。《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施方案》《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戏曲教育工作的意见》《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出台,为传统艺术的起飞和文化复兴增添有力的翅膀。

文化部实施了戏曲振兴工程,开展了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实施了京剧像音像工程,“十三五”期间计划录制350部剧目,并在研究启动戏曲像音像工程。为支持戏曲创作,实施了“名家传戏——当代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开展了戏曲剧本扶持工程,资助了近150部戏曲剧本创作,实施了戏曲艺术人才培养“千人计划”,举办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加大对基层和民营院团的扶持力度,国家艺术基金也累计投入3.51亿元,扶持戏曲项目233个。戏曲工作者坚持创新与复排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创作出一大批深受观众欢迎的优秀作品。

在扶持民族音乐舞蹈方面,文化部实施中国民族音乐舞蹈杂技扶持发展工程,持续开展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组织编纂出版10卷本《中国工尺谱集成》,持续开展中国歌剧节、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等活动。在扶持曲艺、木偶、皮影方面,文化部于2013年对全国25个大型、8个中型和51个小型曲艺、木偶、皮影优秀作品提供了资金支持,在山东举办了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展演及全国木偶剧、皮影戏优秀剧(节)目展演,旨在展示传统艺术品种保护、传承和创作的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进行了深刻阐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让我们满怀信心、精神振奋,同时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团结一致、奋勇拼搏,一定能够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文化部艺术司巡视员、副司长)

长期在文学研究领域发挥着导引潮流、培育风气的重要作用的《文学评论》已整整走过一个甲子。10月10日,《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文艺理论界诸多名家到会。

《文学评论》六十年 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

《文学评论》的三个特色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我认为,《文学评论》至少有三个重要特色值得关注。60年来,密切关注现实,把握时代脉搏,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是《文学评论》最鲜明的思想品格。《文学评论》的前身是《文学研究》季刊,创刊于1957年。何其芳同志在创刊号《编后记》中强调,《文学研究》“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结果。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随着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的临近,1958年《文学研究》第4期《编后记》中指出:“要求全国的作者从各个方面来总结我国这伟大的10年来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为体现出文学研究的现实性、战斗性,翌年将《文学研究》更名为《文学评论》,用大部分篇幅刊载对当代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评论文章。即便是古代文学研究,重点讨论的也是如何继承与发展以及古为今用等亟待回答的重要现实问题。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依然坚持面向当代的办刊方针。改革开放初期,《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拨乱反正工作,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积极组织召开座谈会,讨论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并刊登系列评论文章,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鸣锣开道,专辟“新书新作评价”“中篇小说笔谈”“关于当前文艺思潮的笔谈”等栏目。此后,又专辟“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新时期30年中国文学研究”“台港及海外学人园地”“世界华文文学”等栏目,拓展研究空间。还围绕着“两个崛起”“朦胧诗”“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写作”“网络文学”“莫言研究”等话题,组织专题文章,展开深入讨论,推进当代文学研究,总结中国文学经验。

60年来,围绕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开展积极的学术交锋,始终走在学术的前沿,这是《文学评论》最重要的学术特色。1957年创刊号的《编后记》写道:“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这个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广泛发表各类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

60年来,《文学评论》不拘一格扶持青年学人,确保优秀稿件源源不断,这是《文学评论》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从《《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所收文章可以看出,很多青年学人的处女作,就发表在《文学评论》上。我对该书70多位作者略作统计:30年代出生的有8人;4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各占15人;50年代出生的居多,有30人;70年代出生的5人。这五代人,是目前《文学评论》的主要作者。30年代出生的作者多为新中国成立前期培养起来的,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者,多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生,或者是七七、七八、七九“新三届”大学生。而今,这些作者大多年过耳顺,陆续陆续退居二线。在纪念文章作者队伍中,“70后”虽然仅占很小比例,但他们正奋战在科研一线,已经成为《文学评论》的最重要的作者群体,代表着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未来。当然,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很多刊物都面临着潜伏的危机。《文学评论》能否承担起名刊的责任,能否不断激发思想的活跃,能否持续推动学术的进步,都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学术大讨论

曹顺庆、时光(曹顺庆为四川大学教授,时光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围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学术大讨论里,《文学评论》在其间既充当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又为论争各方提供了建言发声的“会议桌”。笔者在此择要回顾这场学术讨论,算是对《文学评论》光辉历史的一种致敬。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诸多理论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涌入中国,令人眼花缭乱地以共时态呈现在国内学人面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失语症”逐渐与“话语”糅合在一起,悄然潜入文学批评的领域当中。与“失语症”一词颇有渊源的《文学评论》在这“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中,时时扮演着“先锋队”与“组织者”的角色。《文学评论》在1996年第6期刊发了季羡林先生的《门外中文论絮语》一文,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笔者发表在《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辑上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而写作的。季先生在此文中指出,“东西文义理论之差异,其原因不仅由于语言文字的不同,而根本是由于基本思维方式之不同。”正因如此,面对东西方两种话语,我们应秉承“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态度,“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认真钻研我们这一套植根于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文论话语,自己先要说得清楚,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季老这篇深入浅出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了国内学人的密切关注,在极大地“刺激”了相关的学术论证之进程的同时,又在后来学术论争的过程中成为被征引最频繁文献之一。

紧接着季先生的文章,《文学评论》编辑部在1997年第1期特意设立了专栏,精心择选出了四篇论文与一篇报道,集中展示了不同学者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看法和意见。事实上,四篇论文的作者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现代转换”这一命题:秦勒从“转换”的主体条件出发,认为研究者必须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调整自身知识结构,以为“转换”的成功实现提供必要的准备;党圣元则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高屋建瓴地勾勒出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与体系,从而为“转换”规划了较为系统的“路线图”;如果说刘恒想尝试从前辈学人王国维的学术实践历程中寻找“转换”的经验的话,那么,李春青则试图以自己对于“自然”这一范畴的三层内涵的解读作为“转换”与“阐释”的示范。屈雅君对1996年10月17日到20日在陕西西安举办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的综述报道,基本上涵盖了当时学界围绕“转换说”争鸣的各个方面:从“转换”的必然、难点与定位,到“转换”的可能、实例与前景,《文学评论》这一专栏的设立,既是对“失语症”命题的明确回应,也是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在策略、路径方面的有力补充。

在此专栏撰写的《编者按》里,《文学评论》编辑部非常具有前瞻性地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将有一个相当长的探索期,预期将会出现不同观点与争鸣。”这一判断无疑是精准的,因为自此之后,围绕“失语”“转换”以及“重建”等议题的讨论,其时间跨度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反思研探之深都是以往少见的。在这篇《编者按》里,《文学评论》编辑部还允诺,“为了展开这一问题的讨论,本刊将继续刊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后来也确实对上述议题保持了相当的敏感度与关注度,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仍不时刊发相关文章,鼓励学界对此进行持续的切磋与争鸣。这都使得《文学评论》成为学界讨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话题的最活跃、最权威的学术平台之一。

艺海观潮

文化部艺术司 中国文艺报社 合办